

# 中國十大名仕

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黄修明 张力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 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

# 中国十大名士

舒大刚 吴绍轨 主编

# 吉新登字 13 号

责任编辑：王 菁 崔厚泽

封面设计：张宗尧

## 中国十大名士

舒大刚 吴绍仇 主编

---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新华书店发行

石家庄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170 千字 印数：1—10,000—15,000

1992年8月 第2版 1992年8月 第2次印刷

---

ISBN 7-5634-0298-5/Z·35

定价：4.1 元

• 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

主编 舒大刚 吴绍轵  
编委 常金仓 康学伟 梁韦弦  
黄修明 张 力 唐代剑  
蔡东洲 刘伟航 蒋宗许  
江 兰

## 《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序

舒大刚、吴绍轨同志主编的一套《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即将由吉林省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接受。我深切感到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它的意义我们随口可以说出许多，比如说它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等等，这当然是对的，它必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然而我以为，它的意义应当在更深远的层次上考虑。它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别于西方的哲学精神提供了有血有肉的生动例证。我们从中不难看到中国哲学在人生论上与西方的根本不同，中国的人生论强调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把握个体，所以成为个体的内在规定性，揭示个体的现实性和丰富性。中国哲学人生论讲的个体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具体存在，内里包含着社会的整体。中国哲学不是否定个体，而是对个体的充分肯定。西方哲学的人生论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突出超脱社会约束的个人随意性。这样的个体是抽象的、不现实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人生论上的差异不能归结为前者以集体为本位，后者以个体为本位。实际上二者都以个体为本位。问题在于二者论述的个体之内涵不同。中国哲学的人概念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由抽象继续上升到具体，抽象寓于具体之中。人在现实中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个体的人总是体现着社会的整体精神。西方哲学的人概念在由具体上升到抽象之后，再未继续上升到具体，因而个体的人处在与社会整体的对立状态中。说得明白一点，中国哲学提倡爱人，

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人人爱我，从而人们彼此是和谐的。西方哲学宣扬为己，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人人自私，从而人们彼此是对立的。

代表中国哲学主流的是儒家。儒家之外还有道家和佛家。道与佛与儒家大不相同，但是它们的人生论的基本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利己主义仍然不一样。道家缺乏社会责任心，鼓吹“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庄子·让王》），是很自私的。但是它指引人们回归自然，消灭人与物的差别，达到物我相忘，物我为一的境界，其理论归宿恰是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社会与自然的统一，与西方哲学个体与群体对立的个人主义人生论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佛家，其人生论在追求普救众生和精进奋斗方面与儒家并不抵牾，而在向往出世忘我，遁入空玄方面又与道家几近合流，终于与西方哲学的利己主义最后划清界限。儒道佛尽管差异显然很大，但是一旦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时候，它们的共性便显现出来。它们的境界是高尚的，它们的修养是利人的，它们的追求是人道的。鼓吹个体表面上爱人而内心为自己的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面前不能不黯然失色。所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发达了，而西方人的精神竟一直处在痛苦、矛盾的状态，原因就在这里。近世以来船载以入的洋枪洋炮曾经一再割占中国的土地，而传教士随身带来的西方文化却始终未能征服中国人的心，原因也在这里。

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历史的，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当然可以相互渗透，但永远不能彼此取代。日本文化曾受过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接着又受到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然而都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性质，日本文化依旧

是日本文化。当我们说到中国文化优秀的时候，一点都不意味着西方文化毫不足取。事实上中国文化早已包含着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近年兴起迄今仍在继续的“文化热”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把传统文化与封建主义等同起来，甚至看成一切罪恶的渊薮，进而鼓吹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这样的思潮难道能够不令人困惑、忧虑！

读者见到的这套丛书对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很有好处。它把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精英，通过人物评传的方式如实地成系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人是具体的，生动的，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事业，生活情趣、生平遭遇乃至道德境界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表里一致，身心和谐，行为上表现的，恰是内心追求的，不象西方古典豪杰和近世个人主义英雄那样表面上彬彬有礼，口唱爱的赞歌，骨子里却藏着一把为了一己的利益随时准备置他人于死地的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精华，也是这套丛书的价值所在。读这套丛书，首先了解这一点是必要的。

吕绍纲  
1990年2月

## 序

# 是真名士自风流

感谢卓识远见的出版家，编辑出版了这一套《中国文化名人评传》的丛书；也感谢作者奋力笔耕，为我们撰写出了《中国十大名士》的评传。

华夏为举世公认的文明之邦。唐宗宋祖为何？当代伟人评曰“稍逊风骚”。威威扬扬的唐宋开国之宗，逊风骚而成为缺点，可见对华夏政治领袖素质的要求，也深含着文化的意蕴。由此可知：文化名士在华夏过去、今日、将来的意义。而研究过去的大名士，用正确的观点析史衡文评人，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探索中华文化未来之轨迹，使国家和民族在更为健康活泼的文化氛围中繁荣昌盛，站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是有实际意义的好事。

要做到这一点，极为不易。

大凡人在生前，再木讷，也总给予人以鲜活的印象；一旦死去，成为历史人物，再有风云叱咤的生平，也总难给予人以鲜活的印象。“声音像貌，宛在眼前”，那多是亲人或亲近者的体会，要让史家或文史家生肉于枯骨，还魂于腐躯，实在是要笔者自己先有呕心沥血的准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史书浩瀚为烟海，读者却大多是专门家和学者的主要缘故：读不易。当然撰写中也有鲜见的例外：如太史公司马氏，总撰《通鉴》的又

一位司马氏。他们还生的陈胜王,是因为百姓的话被记录:“哟,陈涉这样当王呵!”还有荆卿把匕首藏之于图,吓呆了一扫六合的秦始皇;再有李世民自翻实录,让史官把他干掉大哥、老弟的阴谋都写上;听魏徵的唠叨听不下去了,要“杀掉田舍翁”……似乎有损明君、霸主和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然而恰好相反,这些人的鲜活,却全在这些“有损”的笔墨中才呈现。

而案头却又放上了这么一部书稿。它反映名士,都是作古数百年,数千年的“史人”,可是却让人易读,催人读下去,边读还让人立刻记住苏秦、张仪、李膺、阮籍、嵇康、杜牧、苏轼、杨慎、徐渭、钱谦益……是何年代、是何国度之人,品性如何,因何成为名士,是那方面的名士,对彼时及今世有何影响……开初,看编者要求,撰写者将“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兼用历史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诸理论,力图正确地解释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关系……”使该丛书达到“文字生动活泼,并具有一定引人入胜的情节的各种文化史著,也是了解名人轶事和社会风俗的普及读物”的水平。边看这要求,边心里佩服编者的高明,而同时又腹诽编者的苛求:析史衡文评文,稍有可读性已不易,那里能达到这水平?但读了这部文稿,却居然实感到这丛书确实达到了这水平。有纳罕,有惊奇,也有困惑。这也是作者令我作序,却序不出明堂来的原因:至少还得掩卷三思,才会悟出编者、作者们所付出的天才般的艰辛。所以这序,还只能当推荐启事的文字看。可以说,保证开卷有趣,开卷有益。

废话将结束,总算悟出一点来由:析史评人,应为图把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信念,人物与自然的矛盾突出而编织之,让读者在关切矛盾产生,发展,激化,争斗结果中,去感受史与人

的生命的形成，如汉晋史的演进，明清替代的内涵……也就同时更见该史中名士的风骨。品评，尽量客观地任史、人同台纠葛展示，理解史、人后，读者又会去反馈作者的评述孰公允、孰偏颇。比如老嵇以自身的作为而告诫后代“不肖”，大矛盾中泄出大历史的大悲剧，让人省悟今日之世的铸成大不易，应珍惜。

是真名士自风流。酒好不怕巷子深。不伦不类，或成有益之新类。书稿的不足之处甚多，不伦不类之处亦甚多。但正因为不类不伦中透出前述那些好处，故为之序也。

吴因易

庚午初冬于古绵州

# 目 录

连横军师	张 仪	(1)
五国联帅	苏 秦	(25)
清流泰斗	李 膺	(48)
敷粉阮郎	阮 翡	(71)
竹林俊杰	嵇 康	(96)
风流诗人	杜 牧	(117)
落拓名士	苏 轼	(137)
巴蜀状元	杨 慎	(173)
越中狂生	徐 渭	(197)
晚明文宗	钱谦益	(217)

## 连横军师

张 仪

(约公元前 355——前 309 年)

战国时期，天下器器，狼烟四起，确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当时，文臣武将，灿若群星，数不胜数。文武双全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张仪，就是这众多英雄中的一个杰出人物。

### 一、进鬼谷张仪学术 看天下七雄争霸

张仪出生于何年，现在无籍可考。根据他的政治活动推断，他最迟生于公元前 355 年左右。这个魏国贵族的后裔可谓生不逢时，无缘享受舒适的贵族生活。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贵族阶级的抗争，各诸侯国的逞威争霸。致使中原河山遍地狼烟，四野杀声。也正是这纷乱的时局，使少年张仪形成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他权衡百家，决心学习最有助于施展抱负，也最实用的“术”。当时，有位闻名于世的楚国学者。传说姓王，精通于“术”。这位先生隐居鬼谷，招徒授业，人称“鬼谷子先生”。后世流传的兵家书《鬼谷子》，传说就是他的著作。彼时的张仪便躲进鬼谷，认真地学起治世之术来。

天下局势日趋严峻，各诸侯国剑拔弩张，跃跃欲试。秦孝公任用卫鞅变法，国势日强，威震西陲，时欲东窥。齐威王上承先父桓公创下的霸业，继而任杰出的政治家邹忌为相，实行政治改革，再震国威，雄踞东方，击西掠北。楚国自战国初期悼王时，就称雄长江流域，此时又用吴起变法，成为势倾天下的“南霸天”。而傲踞中原，跨黄河而窥周鼎的魏国，早已是泱泱中央大国。各大国拥兵自重，时刻企图壮大自己，君临天下。其他诸侯小国，为了保存自己，纷纷寻找靠山，以避亡国之祸。

公元前344年，张仪的祖国魏国仗着强大的声威，使用压力，召集十二诸侯同朝周天子，想做诸侯盟主。这一狂妄举动，遭到了韩国等大国的抵制。前342年，魏国出兵进攻不买账的韩国。齐国应韩国之请，以孙膑为帅，田忌、田婴为将，率数十万将士，伐魏救韩。魏惠王的太子申和孙膑的同学庞涓为将，率十万大军迎战。孙膑用减灶诱敌之计，三天内从十万灶减到五万灶，再减到二万灶。狂妄的庞涓以为齐军大量逃亡，不堪一击，只以少数精锐轻装部队兼程追趕。到了马陵（今山东省范县西南），正好天黑。这里道路狭窄，两旁多阻隘。孙膑早已伏兵在此，见庞涓率兵进了伏击圈，就“万弩俱发”。魏军大乱，争相逃命。结果齐军歼灭魏军主力，生擒太子申，庞涓也羞愧而自刎。第二年，魏又受到秦、齐、赵三面进攻，大败亏输。复一年，魏派公子卯攻秦。公子卯中了卫鞅之计，兵败被俘。到了前388年，秦又进攻魏国的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县南），俘虏了大将魏措。魏国不敌秦军，只好转而投靠能与秦国抗争的东方大国齐国。但秦国对这野心勃勃的近邻仍不放心，视为“腹心疾”，还是不断攻魏，又五年，秦惠文君起用魏国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县）人公孙衍为良造。次年，魏被迫献阴晋予秦，和秦

修好。这样，秦国向东扩张就更容易了。前330年，秦公孙衍在雕阴（今陕西省甘泉县南），打败魏军，俘虏魏将龙贾，迫使魏国把河西献给秦国。

中原战鼓惊天，祖国饱受兵灾之祸。张仪这个鬼谷子的高材生，迫不及待地出山来了。

## 二、蒙奇耻初受挫折 凭利嘴轻取卿相

张仪学得满腹韬略，决意闯荡天下，大显身手，依靠一个大国的力量，来平定争乱。他的祖国地处中原，四面受敌，且惠王狂妄自大，无霸王之才。因此，他学成之后，并未归魏，而是把楚国作为他施展抱负的政治舞台。

当时的楚国版图辽阔，居各国之首，雄踞长江中下游鱼米之乡，时刻企图北进，重温庄王时独家称王，悼王时威震华夏的霸王之梦。楚怀王比起显祖显宗来虽觉平庸，倒也心雄志大，总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且楚国人多地广，国力强盛，具有统一天下的实力。张仪认定楚国大有用武之地，于是以鬼谷子高足的身份，叩响了楚国的政治大门。

这位年轻的书生，大概因鬼谷子高足的名声早已传入楚廷，得到了楚令尹的接见。他的出色游说引起了令尹的注意，作为令尹的客人，在府中住了下来。然而倒霉的事接踵而至。令尹的玉璧不翼而飞，阖府哗然。府中门客自然各显本领，要为令尹找回这块玉璧。分析来分析去，大家认为张仪贫穷寒酸，地位低下，嫌疑最大。于是不问青红皂白，竟把张仪当成盗贼捆了起来。几百竹板，打得张仪皮开肉绽，奄奄一息。怎奈张仪连声叫屈，据理力争，莽夫们无赃无据，只好将张仪开释，赶出门去。可怜张仪柔弱书生，出师未捷，竟受此奇耻大辱。细

细想来，或许是众门客嫉贤妬能，以小人伎俩排挤张仪，亦未可知。只是这一变故，楚国与盖世英才失之交臂，竟引来无穷灾祸。

张仪在楚国干政无门，反遭其辱，坏了名声。决定弃楚而去，回家养伤，再谋良策。他遍体鳞伤，回到久别的家中。妻子看到丈夫非但没有衣锦还乡，反被人打成这样，十分心痛，埋怨说：“唉！你不出去读书游说，哪会遭这样的罪啊！”张仪并不因初次的挫折而放弃自己的宏图大略，并不计较受到的羞辱，诙谐地问妻子：“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妻子说：“舌头还在呢！”张仪笑道：“这就够了。”

张仪再次选中的游说对象是秦惠文君。秦国地处西原，国土辽阔，渭河流域物阜民丰，有函谷关和武关天险，易于拒敌固守。更因前朝孝公重用卫鞅变法，励精图治，国力渐强。惠文君承前朝基业，雄踞关外，虎视眈眈，时欲东图。但惠文君继位后错误地杀了卫鞅，罢黜革新派人士，致使人才匮乏。张仪正是看准了这一时机，决计入秦。

关于张仪为何入秦，历史上另有传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写的：

张仪求学于鬼谷子时，有个同学叫苏秦。苏秦也是鬼谷子的高足，但自认比不上张仪。但是苏秦学成后仕途顺利，很快就任了赵国之相。苏秦已说服赵肃侯与殽山以东的诸侯约定，合纵相亲以抗秦。但他担心强秦会攻打各国，破坏纵约，打算物色一个能干的人到秦国去，牵制秦国。他想起了张仪。于是暗中派人启发张仪到赵国去投靠苏秦。张仪受辱于楚，正在考虑新的去向，被来人一鼓吹，就兴冲冲地到赵国去了。但苏秦老是不愿接见张仪，又想方设法不让张仪另往他处。当张仪

吃尽闭门羹，坐够冷板凳之后，苏秦才召见张仪。苏秦大摆国相架子，威风凛凛，却叫张仪坐在堂下，给他吃奴仆的饭菜，还唠唠叨叨地讥讽张仪穷愁潦倒，并说自己虽然一句话就可以使张仪富贵，但却认为张仪不值得收留。苏秦说完拂袖而去。张仪来投苏秦，原以为可以从老朋友处得到帮助，想不到反被羞辱，十分气愤。他决心惩罚赵国，给苏秦找麻烦，来报此受辱之仇。反复权衡，觉得只有秦国可以投奔，日后可以说服秦王收拾赵国，于是他愤而赴秦。

公元前329年，张仪来到了秦国。他将做一番什么事业呢？将怎样制订自己的战略计划呢？《史记》这样记载：

苏秦羞辱张仪，激张仪前往秦国。他对舍人说：“张仪是天下奇才，我比不上他，幸亏我先被赵王重用。现在有能力掌握秦国权柄来帮助赵国的，只有张仪。但他太穷，没有机会求得引荐。我担心他热中于小利不能有大成就，所以特地召他来并且侮辱他，以激励他的意志。”苏秦又向赵王讲了自己的想法。于是赵王就送给张仪金币和车马，派舍人跟随张仪到秦国去。张仪由于赵王的资助，体面地见到秦惠王，一番游说，博得秦惠王赏识，被拜为客卿，与他商讨征伐诸侯的大事。看到张仪初战告捷，舍人才告诉张仪，说自己要离去。张仪说：“我依靠你得到了名誉和地位，正要报答你的恩德，你为什么要走呢？”舍人这才吐露真情：“有恩于你的不是我，是苏相国。他担心秦国攻打赵国，破坏合纵联盟，认为除了先生，再没有谁能执掌秦国大权保护赵国，因此激怒先生到秦国。资助你的车马、资用，全是苏相国的意思。现在先生得到秦王重用，我就要回赵国去回报苏相国了。”张仪这才恍然大悟：“啊呀！这些做法本来都属于我所研习的权谋，我却没有觉察到。这说明我比不上

苏相国。我被秦国任用，首先要感激苏相国，决不让秦国攻打赵国。

这种说法不可信。因为苏秦挂赵国相印是公元前 288 年的事，此时张仪已死近二十年。合纵连横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绝不会是苏秦、张仪玩弄权术而演的双簧。

对于政治家张仪来说，他的行动都是其远大目标所决定的。实际情况是，张仪投奔楚令尹，被诬为盗，受到侮辱，不可能再利用楚国的力量来统一天下，只能利用秦国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使秦惠文君大动其心的演说，确也出色：

“不知道而乱说是不明智，知道而不说是对大王不忠。现在燕、魏、楚、齐、韩等国联合起来，以秦国为敌。秦国身为大国，兵多将广，政治清明，地形有利，但军队战斗力不强，人民困苦，国库空虚，土地荒芜，四邻诸侯不来亲近，不能成霸主之名。这都因为谋臣对大王不忠，没有向大王进献良策。”

“虽然秦国多次在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但敌国‘当亡不亡’，秦国‘当霸不霸’，皆因‘谋臣不为’。历史上的殷纣王、智伯虽居其强，但终以失败而告终。这便是‘当为不为’的教训”。

当时，秦国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职位是大良造，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是张仪的同国人公孙衍。这位公孙先生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政治家，后来脱胎换骨，合纵反秦。

张仪与公孙衍意见不和，发生了矛盾。由于秦君尝识张仪的主张，张仪便代替公孙衍担任了大良造。公元前 328 年，秦国仿效东方国家设立相位，由相掌握国家军政大权。大良造仅为虚爵。张仪终于当上了秦国之相。